

国际政治

权力转移及其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

王公龙

[摘要] 在世界经济不平衡增长、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正在由超级大国向崛起大国转移;由“极”世界向“非极”世界转移;由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超级大国通过霸权谋求私利的可行性在降低;大国和平崛起成为惟一的选择;大国战略博弈中非对抗性竞争的成分在增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加强。但权力转移也使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关键词] 权力转移;世界政治;影响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4-0001-05

近年来,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新兴强国的崛起,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无极”(nonpolarity)的世界。也有学者认为,多极化并不能解释当今世界政治中的许多现象,世界正在出现“非极化”发展趋势。^[1]应该说,上述论断反映了学术界对世界政治中新兴力量崛起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敏锐的关注,为我们深刻认识当代国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还应看到,“极”和“非极”力量对比关系变化,其实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国际行为体权力的此消彼长,无疑会促使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新一轮转移,并对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此消彼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国际体系转型的态势日益明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行为体之间权力对比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

第一,超级大国的权力相对弱化。毋庸置疑,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软实力,美国都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优势,但这些优势无法掩盖其权力下滑的事实。最近,美国就有学者撰文指出,“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衰退”,布什政府执政时期是美国走向衰落的

起点。未来,美国的权力还会继续衰落。^[2]经济上看,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元的霸主地位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其在水世界经济、贸易及金融方面所占的份额有所减少,科技领先水平已较过去相对下降。^[3]政治上看,美国虽然有力量制订世界政治日程,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控制这些日程的演变。^[4]美国要求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意见未必会被其他国家采纳;美国领导的针对古巴等国家的制裁政策早已不再奏效;美国无法独自解决伊拉克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和阿以问题。美国在应对苏丹、缅甸问题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5]安全上看,美国虽然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几场战争,但并没有彻底击垮恐怖主义,未来美国还将长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第二,新兴经济体权力日渐增强。冷战结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一大批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崛起。从整体经济实力来看,截至2007年年末,“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集体进入世界经济前十强的趋势更加明显。^[6]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等中小经济体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增速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7]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也随之增强。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力图获取权力资源,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型权力单元。非国家行为体既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又包括非政府组织;既包括跨国公司,又包括媒体巨头。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力图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获取权力,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总的来看,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正在日趋激烈地冲击着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

二、权力转移的基本态势及其主要动因

伴随着国际行为体权力的此消彼长,世界权力开始在四个层面上发生转移。总的趋势是由集中趋向分散,由传统权力中心趋向新兴权力行为体。

第一,权力由超级大国向崛起大国转移。从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态势看,超级大国权力出现下滑,崛起大国权力正在上升,国际力量对比在冷战结束之初一度出现严重失衡的发展趋势已开始减弱。由于无法改变权力转移的大趋势,超级大国不得不逐步接受权力转移的现实,其对大国和平崛起的容忍度开始增加。近年来,美国虽然在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但其基本趋势是不断加强和中国的“接触”,把开展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放在突出的位置。其原因不仅在于“接触”政策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在于两国之间权力的转移使得美国无法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二,权力由“极”向“非极”转移。传统意义上的“极”指尼克松所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只是西欧演变成今天的欧盟。“非极”指的是“极”以外的世界力量。冷战结束后,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非极”力量的“争权”意识明显增强。当前,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发展中大国强烈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新兴经济体的投票配额,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影响力;在印度、巴西等国的积极努力下,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协调员”先后推出两份关于“中间方案”的报告,提升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性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无力操控。

第三,权力由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金砖四国”、“展望五国”都属于非西方世界。虽然它们并未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阵营,但非西方世界力量的整体性上升将不可避免地传统国际关系中西方权力的垄断地位形成冲击。尤其是,当前西方世界正在经受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接连

陷入衰退之中,这无疑会导致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整体性出现弱化。随着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权力的非均衡增长,它们所代表和倡导的价值观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非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制权也会有所增强,并相对削弱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的垄断地位。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已经进入“后西方时代”,西方原本掌握的绝对主导权将不复存在,正在被迫同发展中大国分享。^[8]

第四,权力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主要形式有:其一,国家行为体出于谋求更大、更多利益的考虑,主动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部分权力。比如,欧盟理事会不断扩大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各主权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安全等领域政策决策权的部分让渡。欧盟权力的不断增多就意味着成员国权力地位在某些领域的弱化。其二,非国家行为体倚仗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国家行为体争夺权力。比如,在人类对能源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拥有能源生产、开发等能力的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无疑会增大。它们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制定权、决策权以及经营权并不完全受制于民族国家,通常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来独立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样,原本为民族国家所完全控制的能源决策权就被部分转移至跨国公司手中。其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可以通过横向的合作,提高权力资源的积聚效应,迫使国家行为体改变决策,削弱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地位。在当今的世界上,随着媒介的扩展、交通方式和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快捷化,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世界媒体巨头,世界各地的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借助先进的通讯技术保持同步性、同时性,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问题上形成一种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一种权力资源的积聚效应,与国家行为体展开权力较量,弱化国家行为体的决策功能和影响力。其四,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拥有武装的恐怖主义组织或军事集团,则通过暴力威胁或直接实施暴力行动,来对抗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权威,挑战国家行为体的合法性,削弱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地位。

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转移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因,是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必然产物。

第一,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一国赖以获得权力的主要资源,其中经济实力更是基础性资源。在和平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拥有一定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大国或中

等强国,都致力于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由于各国的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国力量的非均衡增长在过去 10 多年间表现明显,未来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见下表)。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转移。

表 1 各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1990	2000	2006	2008	2013	2000 到 2013 年间的变化
美国	26	31	28	23	21	- 32%
中国	2	4	6	6	9	+ 144%
日本	14	15	9	8	7	- 55%
德国	7	6	6	6	5	- 11%
英国	5	5	5	5	4	- 9%
法国	6	4	5	5	4	+ 6%
俄罗斯	2	1	2	3	5	+ 455%

表 2 世界主要经济体不平衡的 GDP 增长率

	1993- 2000	2001- 2008
美国	3. 7	2. 2
中国	10. 6	10. 1
日本	1. 1	1. 5
德国	1. 7	1. 3
英国	3. 2	2. 4
法国	2. 2	1. 7
俄罗斯	- 2. 1	6. 7

表 1 和表 2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展望数据(2008 年 10 月)。^[9]

第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资源、人员、技术和信息的跨国、跨地区大规模的迅速流动。对国家行为体而言,那些善于抓住全球化时代发展机遇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甚至是跳跃式发展,缩小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机会获取军事资源,军事实力迅速增大的可能性大为提升。尤其是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一些中小国家有可能掌握威慑、反制大国军事威胁的手段,从而使大国的军事优势难以发挥出来。^[10] 对国家行为体而言,全球化也是它们获取权力的难得机会。跨国公司可以迅速运送人员,开展国际投资,大规模迅速移动资金和财富;恐怖主义组织则可以运用因特网招募、训练恐怖分子,在各国银行间移动资金,运用全球运输系统运送人员;国际媒体巨头可以利用因特网传送信息,控制某一议题的国际话语权,对主权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和压力。

第三,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催化。当前,这场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但由于在国际金融体

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存在差异,各国在危机中遭受冲击的程度也有差异。比较而言,美国、欧洲、日本遭受的冲击较大,一时还难以走出困境。而中国、印度等崛起大国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并有可能率先走出低谷。因此,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震荡,世界主要力量的权力关系调整的力度有可能加大。美国有学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使“世界重心偏离美国的趋势有可能加快”。虽然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力量却得到了加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1]

第四,超级大国的过度扩张。超级大国的过度对外扩张,削弱了自身的权力尤其是软实力。对美国而言,无论从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还是人道上看,对伊拉克的战争都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催化了美国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12] 迫使奥巴马政府选择所谓“巧实力”战略。

三、权力转移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双重影响

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转移促使国际体系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动,从以国家行为体为基本单元的单一型力量结构,逐步演变为集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于一身的复合型力量结构,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多元化并行发展的态势进一步显现。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转型无疑会对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超级大国通过霸权谋求私利的可行性在降低。在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超级大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增多,开展国际合作的需求在增加。在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在自身权力相对弱化的情况下,使用硬权力以强制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不仅越来越难以奏效,而且会对世界战略格局的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并最终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何况,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美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合作的动力在增强。相比传统安全,美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脆弱性更为明显,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更为迫切。尽管“9·11”事件后美国致力于反恐,并先后发动了两场战争,但恐怖主义至今依然是困扰美国的安全难题,美国对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的依赖将长期存在,这也将成为抑制美国霸权倾向的重要因素。此外,从全球环境、气候变化、胚胎克隆到能源安全,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已经超出美国传统的盟

国体系或集团关系的能力范围,美国将不得不适度收敛其霸权倾向,与其他国家行为体乃至非国家行为体开展合作去解决日益增多的跨国问题。

第二,大国和平崛起成为惟一的选择。其一,崛起大国很难获取足以挑战世界霸主的权力优势。随着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崛起大国与世界霸主之间的权力差距还可能继续缩小,但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分布日益分散化,崛起国大规模积聚乃至垄断世界权力资源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崛起国惟一的选择只能是以和平、合作的方式与霸权国和其他大国展开和平的权力竞争。其二,崛起大国必须应对来自其他崛起大国或次强力量的竞争和压力。由于一批世界大国和次强力量的同时崛起,彼此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牵制。对某个崛起国而言,除来自霸权国的挑战外,其他崛起大国和次强力量也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其构成压力和挑战,何况,它们还可能与霸权国形成战略同盟或战略合作关系,以集体的方式牵制崛起国的崛起,这也将迫使后者不得不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转移至应对霸权国之外的国际竞争,从而分散了权力资源,降低了其挑战霸权国的战略冲动。其三,非国家行为体对崛起国权力的制约增大。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崛起国权力的使用也会日益明显地受制于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既可以在政治上施加强大的压力,如联合国发表的声明;又可以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的决策或跨国公司作出的反应;还可以制造强大的舆论声势。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按照历史标准,今天崛起的强国都相对温和。哈佛大学学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甚至断言,“我们或许正处在一个自人类存在以来最和平的时期”。^[13]

第三,大国之间战略博弈中非对抗性竞争的成分在增多。从博弈的形式看,双边博弈正日益被多边博弈所取代。在安全领域,防扩散、地区安全、反恐日益成为大国开展多边合作、谋求共赢的新的生长点。在经济领域,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召开多边国际会议特别是国际峰会商讨对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最主要的外交途径。以谋求合作为基调的多边外交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最有活力的外交形式之一。从博弈的内容看,国家间博弈既有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竞争,也有能源、环境、文化等领域的竞争,这使得传统的同盟体系与合作关系难以适应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新现实,各大国主要依据自身的利益,确定其在具体领域的政策,而不是单纯以政治立场或

意识形态划线;大国竞争日益从军事、经济等硬权力领域向价值观、文化等软权力领域倾斜。相比硬权力竞争的对抗性,软权力竞争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共存性,竞争的烈度也相对较低,并蕴涵着国家间交流和合作的机会;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应对这一威胁成为各大国共同面临的新课题。战略上具有竞争性的大国,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对对方的战略利益会有相对多的照顾,^[14]彼此互为对手的可能性在减少,成为合作伙伴的必要性在上升。总的看来,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大国间的博弈正在呈现出双重博弈的特征,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对立的区域。大国竞争态势中出现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竞争并存的状态,非对抗性竞争的成分在增多,大国博弈更加具有协调性和协作性。“竞而不破”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新特点。

第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得到加强。长期以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行为始终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随着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对弱化,其霸权主义倾向势必有所收敛,世界其他力量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相应增加。与此相应的是,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遭受侵蚀和削弱。^[15]随着非西方大国和次强力量的崛起,反映它们利益需求和行为方式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也势必会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权力竞争中,非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和影响力,这有助于促进世界范围内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此外,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增加,它们也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传播着自己的观念和主张,推动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比如,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体现了民主的精神。随着联合国地位的提升,其所推崇的民主观念也将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动力。

但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也会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安全形势造成不确定甚至是负面的影响。

第一,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世界的无序性在增加。超级大国虽然是国际秩序的建造者,但由于对国际秩序的控制力趋于下降,不仅不再致力于维护既定的国际秩序,有时还会带头挑战某些领域的国际秩序。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前就曾呼吁,为了应对美国正在面对的“迅速移动的威胁”,“改革现存国际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具有紧迫性。”^[16]同时,正在崛起的大国和次强力量对国际秩序的现状也并不满意,希望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由于超级大国和崛起大国都希望国际秩序的演变有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它们在如何改造国际秩序问题上又存在明显的分歧,这就决定了国际秩序的演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几股力量相互竞争、牵制和折冲的过程,并充满了不确定性。近年来,无论是在安理会扩大还是在全球核不扩散问题上,人们都可以看到崛起大国和次强力量不断向既定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此外,国际行为体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影响国际秩序有序运行的因素的增多,这无疑会加大国际秩序有序运转的难度,国际社会形成共识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全球变暖问题、多哈谈判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日益多元化,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首先,随着权力的转移,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安全的行为体数量、类型也在增多。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国家行为体不得不同时面对多种类型的安全挑战,不得不将有限的安全资源转移至不同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弱化国家应对主要安全威胁的能力。其次,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即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全球性问题”,其行为主体呈“网络化”转移于世界各国)、多样性(既有军事领域,也有经济领域、公共安全领域、自然环境领域等)、突发性(即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互动性(即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行为体乃至国际社会而言的确是一个新的严峻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增多、影响的扩大无疑会增加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此外,随着权力的进一步转移,未来世界上将有更多的国家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此同时,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也在极力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一旦这类武器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扩散,将会导致国际安全秩序的严重失衡,其破坏力难以想象。^[17]

总之,权力的多层面转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世界权力正在日益趋向多元化、分散化。权力的转移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变动,既为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增强了动力,也增加了国际秩序发展的不确定性

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不过,权力转移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国际体系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权力转移的形态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各个层面权力转移的方式、力度、持续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也不尽一致,彼此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因此,对权力转移趋势及其影响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注释]

- [1] 参见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第2—3页。
- [2] Robert A. Pape, “Empire Fall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09, p. 21, p. 34.
- [3] 甄炳禧:《世界新格局下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J],《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36页。
- [4] [8] 杜平:《国际秩序进入“后西方时代”》[N],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2月1日,电子版, http://www.zaobao.com/specila/forum/pages6/forum_zp080201.shtml。
- [5] [12]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 [6] 高祖贵、付宇:《当前世界政治深度调整的新特点》[J],《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第6页。
- [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7, p. xi,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7/02/pdf/text.pdf>。
- [9] 转引自 Robert A. Pape, “Empire Falls”, p. 23, p. 24.
- [10] 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第2—3页。
- [11] [15] 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09.
- [13]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http://www.newsweek.com/id/135380>.
- [14] 刘鸣、黄仁伟、顾永兴:《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J],《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19—20页。
- [16]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09.
- [17] 沈丁立:《核扩散与国际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7页。

作者简介:王公龙,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233)

收稿日期:2009-04-22

修改日期:2009-05-24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Power Transference and Its Impact on World Politics *by Wang Gonglong*

Against the comprehensive workings of the unbalanced growth of world econom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power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transferring from superpower to emerging power, from “polarized” world to “nonpolarized” world, from the Western world to non-Western world and from state to non-state units.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transference, the feasibility of superpower gaining selfish interests through hegemon is decreasing, peaceful rise of big power is becoming the sole choice, the non-confrontational elements in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great powers are increasing, and the momentum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is being strengthened.

- 6** Analysis of Symbolic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by Li Mingming*

Symbolic politic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By creating and using a set of symbols, EU constructs its image and identity among citizens and in the world. We acknowledge that symbolic politic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But due to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ed mode, EU symbolic politics still exists some limit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 12** The Disproportionality of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dels in Germany and Japan *by Zhou Jie*

The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 and mixed-member majority system, or the German model and the Japanese model. The disproportionality of the Japanese model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rman model, which is seeming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s. However, the paradox between plurality-majority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s still the essential ca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8** An Analytical Study of U.S. Policy on the Talk of Preventing Incidents at Sea: Comment on “US-Soviet Agreement to Prevent Incidents at Sea” *by Wu Shaojie & Li Y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eld talks on preventing incidents at sea twice between 1971 and 1972, and signed the “US-Soviet Agreement to Prevent Incidents at Sea” in May 1972 which provided rules of conduct and operation for the two navies and established measures and mechanisms of preventing and dealing with incidents at sea.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made the number of incidents at sea de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promoted the further detente of US-Soviet relations and world peace and provided other countries with ways of solving similar problems.

- 24**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in International Eth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by Zhang Wang*

Cosmopolit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represent two main international ethical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